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1921—1971

人民出版社

22. 23
106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1年7月第1版

197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293 每册0.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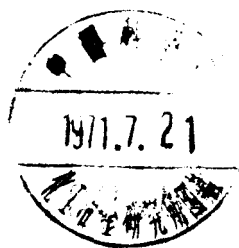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象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好，白色恐怖、特务横行也好，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

也好,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已经发展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但是,正确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林彪同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毛主席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路线，引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否认它，或者口头上

承认,实际上否认,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夺取政权,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样四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二十八年，才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又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的问题，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又指出民

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

失败。后来，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

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

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化为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结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

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进军陕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

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在党内，就是我们党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叛徒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他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

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规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后来，毛主席又在《论政策》等著作中，反复地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由于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纠正了在同国民党作斗争时出现的“左”的倾

向，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紧紧地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四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